

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

经盛鸿

2001年底,一部约120万字、全面反映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史的巨著放到了我们面前。它就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宪文教授主编、陈谦平、陈红民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展卷细读,一股浓烈而又清新的学术气息扑面而来,它以新的理念与思路,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与生动的笔触,展现了中国人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14年间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复杂而悲壮的历史,歌颂了中国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行各业人民,首先是中国军队,为抗战御侮、保卫祖国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斗争。这是一部内容详尽丰富、评论准确客观、学术水平与写作水平均为上乘的抗战史学术专著。

张宪文教授及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以抗日战争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宪文教授在主编专著《中华民国史纲》时,就对抗日战争史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发现抗战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针对当时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中重共产党敌后战场、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偏颇现象,着手研究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主编出版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写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史的构想。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将该课题立为重点研究项目。张教授组织课题组中一些年富力强的学

者,开始了对本课题的系统研究与写作,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历时十多个寒暑,终于成就了这部巨著。

该书以抗日战争的作战史(军事史)为论述重点,但也兼及到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诸方面,不仅使作战史的论述有了坚实的基础,也反映出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面貌,可以说是中国抗战史研究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下面仅举其要者谈几点: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体例新。它把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即第二次日中战争史,从传统的“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这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与国际史学界接轨。众所周知,日本史学界早就采用“日中十四年战争”这个概念与体例。但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却一直沿用“八年抗战”这一说法;而大陆史学界多年来关于抗战史的论著也基本上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八年抗战的体例与写法。直到近十几年来才有人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作为全面、系统论述中国抗战史的学术巨著,在深入研究与全面、客观、真实反映历史的基础上,第一次把“十四年抗战”的理念与体例融入到全书中去。正如该书“总论”中所说:“将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研究,改变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将七七事变前后割裂为两个不同性质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缺陷。”更为可贵的是,该书不仅采用了“十四年抗战”体例,而且作为论证,书中以极为丰富的史料与精当的论述,展现了中国人民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这6年间的抗日救亡斗争,并肯定其在整个抗战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布局严谨。书中

始终紧紧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个主题,强调民族战争、全民抗战,肯定两个战场的作用,客观而又详尽地展现了在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行各业的人民为了抗日救亡所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与伟大贡献,而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战争史的巨著。毛泽东多次指出,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即成为主要的矛盾,其他矛盾都退居为次要矛盾。这是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史的主题,也应是抗战史的史学著作的主题。但以往一些抗战史研究论著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空、粗与失之偏颇的缺陷。在内容上,领袖著作讲得多,会议讲得多,党内斗争讲得多,国共两党斗争讲得多,而对抗战史的主题与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如何在各条战线,首先与主要在军事战线上、在战场上英勇悲壮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斗争反而写得较少,甚至许多重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都有重要影响与作用的战役与战斗,都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使读者无法了解抗战史的全貌与真实内容,甚至对中国人民怎样通过血与火的斗争才取得十四年抗战伟大胜利都不十分明晰。这不能不说这是多年来抗战史研究一些论著的一个重要缺陷。《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力图克服这种错误的偏颇与“左”的影响,而以“尊重客观事实,客观、真实地反映抗日战争,强调民族战争,全民抗战,肯定两个战场的作用”作为追求的目标。

该书作者始终围绕与突出“全民抗战”这个中心,不仅详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及发起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也以应有的篇幅,客观、详尽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及其各重要战役,不仅写了陆战,还写了空战、海战,不仅写了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战斗,而且写了中国军队进军缅、印战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等。书中还列专节详细论述了国民政府军

队在敌后开辟的冀豫、苏鲁等战区及其作用。对国、共两党分别指挥的对日作战的各重大战役,不仅史料详实,始末毕现,论述严谨,充分展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与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爱国精神,而且深入分析胜负得失及其原因,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与此相适应,一些与“全民抗战”这个中心相距较远的历史事件,就淡化处理,把这些内容留待其他学科去研究。这是十分恰当与明智的。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史料丰富而详实,分析细致,评判客观公允,令人信服。严谨的史学著作都是建立在丰富、详实而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的。张宪文教授在其以往的研究著作中,以运用丰富而新颖的民国史资料见长。这次他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不仅继承了往昔风格,利用地利之便,大量挖掘与使用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民国史资料,而且广泛地吸纳了台湾、日本、乃至美、英、德、俄等国的有关史料,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仔细考订,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显得史料丰富而扎实。例如本书第三章在论述1935年华北事变这段极其复杂的史事时,既引用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军委会、外交部、关务署的机要档案,又引用了蒋介石、陈立夫、蒋廷黻、谌小岑及苏联季托夫等许多当事人亲见亲闻的回忆史料,《大公报》、《国闻周报》的报刊史料,以及李云汉、吴相湘、秦郁彦等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等,从而使立论更为公允。而对馆藏的档案史料,如《军中日记》、《作战详报》等,作者也能仔细考订,去其水份,存其真相,在史料的运用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而尤具功力与眼光的,是该书对抗战中许多重大史事,特别是对许多重大战役的分析评判上。如书中第二章对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作者既肯定了“中国军队15万疲惫之师在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情况下,英勇抗击了日军机械化部队5个半师团10余万人的优势兵力,以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歼敌逾万人,是值得

后人称道的”,又从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实施以及部队素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国民政府在军政方面的重大失误,从而导致了保卫战的失败与中国军民的惨重损失。再如,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战况复杂,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本书评判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果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的实际战略与战力。”日方兵力紧张,但却能“利用有限的战力,选择突击奔袭的战术”,“在具体战役的策划准备上,细致而又周详,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日军攻占长沙后,为宣传起见,“严肃军纪,严禁破坏和掠夺”,以至使长沙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等等,显示了日军不同于战争初期的新特点;而中国军队虽经休整,但畏敌心理依旧,战斗积极性不高,且内部许多固有的弊端又蔓延开来,所以仍吃败仗,事后又常把敌人的主动退却当作战果大事张扬……这些分析评判既客观公正,又要言不烦,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抗战史的认识与思考。

无可讳言,《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全书以写战争史为主,详细论述了抗日战争中的各重大战役、战斗数十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全书竟没有一幅配合文字的战争示意图,包括战略性示意图与战役性示意图,同时也没有编制一份抗战史事日志作为附录。这就必然给读者了解与评判抗战全过程与各次战役的得失等带来困难,完全成了“纸上谈兵”。因为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的,地图与日志等对展示战争与战役的过程与揭示历史的规律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其次,日军所进行的细菌战、毒气战等,书中虽在某些战役中略有涉及,但未能将其作为一种日本侵华的战略战术进行更详尽的论述,而在此方面,学术界已有相当的资料公布与研究成果。再次,在写作上,书中涉及到对在这场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中起过各种作用的重要历史人物很多,但均是一笔带过,如能相应

地予以介绍、分析，并对其历史作用与地位给予评判，对读者全面了解抗日战争史，总结经验教训，则会大有益处。

任何学术著作，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作为一部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巨著，理应有更高的标准与追求。希望本书在重版时，能精益求精，广泛吸收海内外学术界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弥补这些缺陷。

(作者经盛鸿，1945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